

香港における／香港からみた中国近現代史

倉田 徹（立教大学法学部） tkurata@rikkyo.ac.jp

はじめに

「雨傘運動」前後の香港：歴史をめぐる論争が絶えない

- ・ 中国による「一国二制度」の再定義
- ・ 民主派よりの者による中国史・香港史の新しい見方の提起

→香港をめぐる「歴史の争奪」を追う

1. 香港を生んだ歴史の展開

(1)歴史の産物としての「一国二制度」

- ・ 三条約（南京条約、北京条約、新界租借条約）
- ・ 第二次大戦後：分断（1950～）と格差の拡大（大陸の混乱←→香港の経済発展）
- ・ 1984.12.19「中英共同声明」：97.7.1 返還を決定←→「一国二制度」で資本主義を維持

→1984年（中英共同声明）・90年（香港基本法）までの歴史を前提にした制度の配置

(2)返還後：「一国二制度」の前提の変化

- ・ 香港の変化：経済的地位の低下、価値観の変化（経済重視の転換）
- ・ 中国の変化：資本主義の浸透、経済成長→政治・軍事的大国化
- ・ 中港関係の変化：経済面での中国依存の進展、中港矛盾

→「転がる香港（中国）」を「五十年不変」で「凍結」したことの問題が発生

2. 中国から見た香港史

(1)「古い」香港史：「鄧小平理論」？

- ・ ナショナリズムへの訴え：「第二の李鴻章にならない」
- ・ 経済面での香港の優越の認定（「一国二制度」は香港経済が進んでいるから）

→近現代史を通じた「一国二制度」の正当化、現代史以外では中港コンセンサス

(2)「新しい」香港史：強世功『中國香港』

- ・ 「一国二制度」の起源を清代の統治に見る（「一国二制度」は辺境だから）
- ・ チベットと香港の異同：イデオロギー絶対主義の終焉

→「天朝主義」：近現代史の「超克」を目指す？

3. 香港の異論：新しい中国史／香港史

「中港矛盾」→「本土派」台頭→「公定」の史観に挑戦

- ・陳雲『香港城邦論』ほか：香港はすでに独立した都市国家
- ・香港大学生会『香港民族論』：香港は大陸とは異なる民族
- ・方志恒編『香港革新論』：雨傘運動後の自治を模索、立論のために歴史を新しく解釈

(1) 「周縁性」

- ・「海洋民族」としての歴史（新界中心の否定：農村は今の香港に引き継がれていない）
 - ・ネットワークの重視：「華南文化圏」論（香港の後背地は中国大陸だけではない）
- 「北方」・「大陸」からの離脱

(2) 「脱中国」

- ・中国は新しい宗主国（王道ではない）
- ・人種民族主義の否定
- ・愛国心の否定（省港スト）
- ・都市国家論

→「中国国民」性の否定

(3) 「西洋性」vs「中華性」

- ・科挙ではなく西洋式学問
 - ・香港は正統華夏文化の保存基地、香港が正統で中共は蛮夷
- 分裂する香港観

(4) 香港の「優越性」＝大陸の「劣悪性」

- ・「世界標準」の「核心の価値」（進んだ価値観の信奉、世界の潮流との一致）
 - ・大陸の墮落（権貴資本主義、土地改革）
 - ・中国の将来への悲観（強権政権の崩壊）
 - ・香港（1841）の体制は、中華民国（1912）や中華人民共和国（1949）より古い
- 中国と香港の差異・断絶・対立を、現代史（文革＋天安門事件）だけに限定し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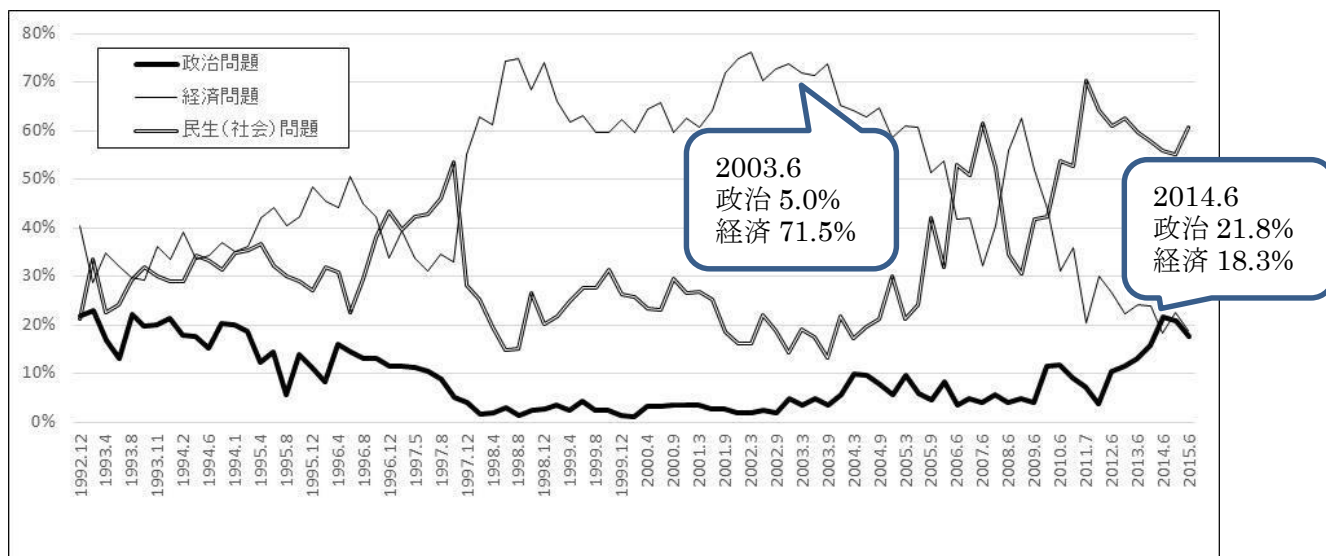
おわりに

- ・「一国二制度」：香港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香港とは何か？）は曖昧
現在の香港の位置づけのために、歴史観の争奪が激しい
- ・中国が目指す香港の「チベット化」←→香港自身は「台湾化」
- ・香港政治＝「時間の政治学」（Borrowed Time, Borrowed Place）
2047年に向けての「歴史の争奪」は続く

【資料編】

資料 1 香港市民が最も関心を持つ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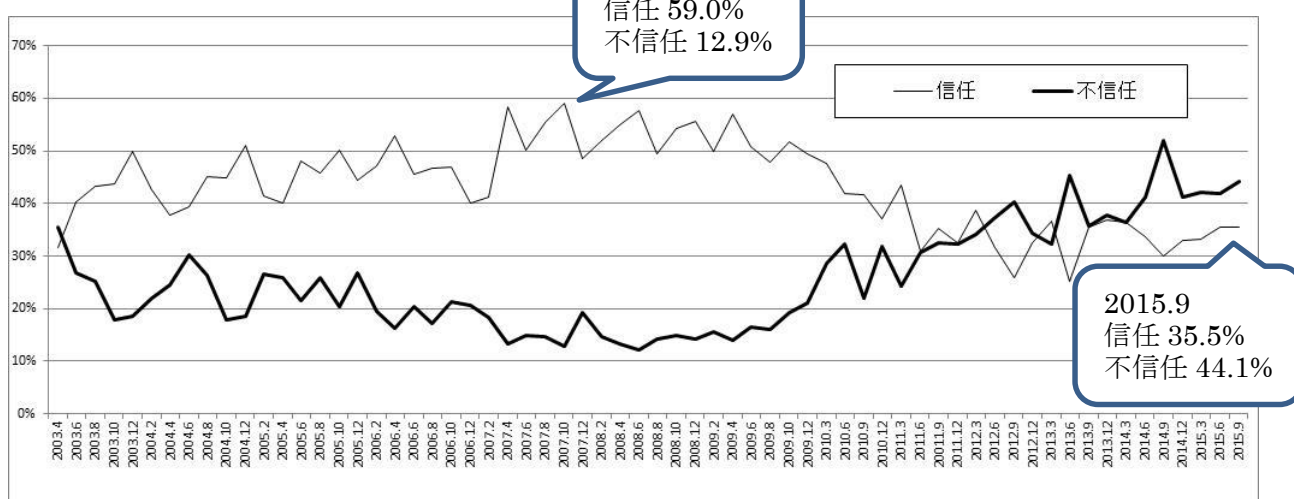
Hong Kong is currently facing various problems. What kind of problems are you most concerned with?



出所 :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s://www.hkupop.hku.hk/english/popexpress/mostcon/mconq88/poll/datatables.html>, 2015年10月18日閲覧)

資料 2 香港市民の中央政府への信任度



出所 :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s://www.hkupop.hku.hk/english/popexpress/trust/trustchigov/poll/datatables.html>, 2015年10月18日閲覧)

資料3 鄧小平「李鴻章にならない」

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12〕!

1982.9.24 サッチャー英首相との会談での談話

(中共中央文献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p.12)

資料4 鄧小平が語る「五十年不変」の理由

中國現在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在兩個十年內，即到本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達到了這個目標，中國也不算富，還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這祇能算是我們雄心壯志的第一個目標。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不是說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末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離開了這個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沖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

1984.12.19 サッチャー英首相との会談での談話

(趙睿・張明瑜主編『中國領導人談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p.513)

下個世紀還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麼能變呢？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爲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實際上，五十年祇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

1988.6.3 「90年代の中国と世界」国際会議での談話

(『中國領導人談香港』p.521)

資料5 「一国二制度」の起源はチベット政策に

毛澤東在1948年闡述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思考時，就把西藏與港、澳、台問題放在一起來思考(參見第五章)。1951年中央通過簽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解決了西藏問題，直到1959年西藏叛亂，“十七條協議”一直是中央治理西藏的基本法。但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十七條協議”與中央對台政策“葉九條”以及中央對港方針“十二條政策”，就會發現後來的內容越來越豐富，但基本框架卻來源於“十七條協議”。這三份文件貫穿了一些共同的政治原則。

(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pp.112-113)

資料6 チベットと香港の異同

為什

麼鄧小平能够在保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水火不容的制度五十年不變，而毛澤東當時不能保證西藏的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保持五十年不變呢？這可是政治哲學中古今之爭和中西之爭的大難題。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說到底是兩種不同的現代性道路，是現代內部的衝突。社會主義甚至脫胎於資本主義，如果不是冷戰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完全可以和平共處。

二者都把人民主權作為政治奠基石。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還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如果要把中國建構為一個現代國家，在政治哲學上都不可能容許西藏存在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和貴族農奴制。這種分歧是古典與現代之間一場生死存亡搏鬥，就像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一樣，是一場圍繞現代自由概念展開的一場搏鬥。今天，我們必須在現代的立場上，在路德宗教改革、英國光榮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立場上，看待毛澤東平定西藏叛亂所採取的政策。

(『中國香港』pp.124-125)

資料 7 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

中國天朝主義（簡稱天朝主義或國朝主義）是我提出的一個標識，是對現下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概稱。現在很有一些以華文寫作的學者認為：一、中國不是現代（西方）意義的民族國家或帝國；二、當代中國黨國體制是強世功下文說的「傳統中國政治遺產」的繼承者；三、大清帝國是傳統中國天朝式政治視野的極致表現，也是今後中國政治想像的模版。我將這樣一套話語稱為中國天朝主義。

（『蘋果日報』、2011年1月30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apple/art/20110130/14922760>）

資料 8 海洋民族としての香港

其實早於英軍登陸之前，香港本身已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海洋中華社會。值得一提的是，因明代實施海禁，此一海洋社會體系飽受陸上族群及朝廷歧視，屬中華帝國的底層，至雍正年間方得改善。英軍登陸時，香港已有數千居民，人口雖不算稠密，但並非殖民歷史觀所說之荒島。

王俊杰「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二〇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香港民族論』、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年、p.34）

一、海洋社會：香港意識的發軔期

坊間普遍會將新界史視為香港史前史。這些說法大多會輕輕帶過從百越到唐代的歷史，然後提及五大氏族如何於宋元之交遷居新界，客家人如何隨五大氏族遷入，然後面對清初遷界、復界的挑戰。這套史觀只著眼於廣府及客家這兩大陸上族群的歷史，比較少著墨於福佬及蠻家這些海洋族群的歷史。

然而，新界其實要到開埠57年後的1898年才成為香港的一部份。由於新界社會與香港社會存在着極大差異，英國須以間接管治的方式將新界與市區分開管治。要到六、七十年代開拓新市鎮時，新界才逐漸融合為香港的一部份。香港開埠時，新界大氏族並沒有擔當太重要的角色，早期香港華人精英亦多為海洋族群的成員。那麼說，香港史前史就必然是福佬及蠻家等海洋族群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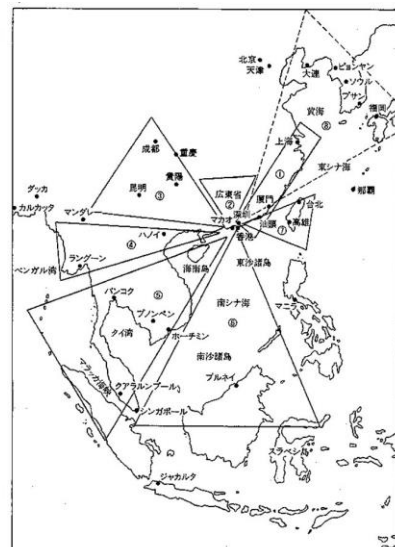
（徐承恩「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識史」『香港民族論』 pp.128-129）

資料9 香港にとっての南洋の重要性

Sean 提到的「華南文化圈」，其實很值得港人注意——特別是當下港人論及香港發展，只懂北望，而忽略這個香港之南、曾是腹地之一的東南亞。很多港人大概已忘記，冷戰時期，對香港電影業，乃至與很多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員關係密切的紡織業來說，東南亞（特別是星馬）是賴以生存的區域腹地。例如 1948 年 7 月出版的《金融日報》，就曾這樣報導：

「華南紡織品最大的銷處是南洋，……而香港則貨幣穩定，外來原料無管制，且接近南洋，於是資金逃到該地去，而形成了紡織業的蓬勃氣象。」²

拙著《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主張將香港置於更廣闊的脈絡之中、重寫香港歷史，目標之一正是為了打破社會現正流行、視野局限於北方的框架。十九世紀的香港，曾被評為「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香港一路走來，亦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說，其經濟網絡涵蓋八大腹地³，當中包括北連海峽、南接耶加達、橫跨東海南中國海、被比喻為「亞洲地中海」的「東亞經濟走廊」⁴。但時至今日，「警惕外國勢力」、「降低英語重要性」卻逐漸成為香港政治日常用語。



香港の後背地

濱下武志『香港—アジアのネットワーク都市』、ちくま新書、1996年、p.123

鄭健銘「華南文化圈——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

(方志恒編『香港革新論：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為香港前途而戰』、漫遊者文化事業、2015年、pp.205-206)

資料10 「新宗主國」批判

九七後，中共形式上結束英港殖民政權統治，但特區政府卻仍然依賴英國人遺留下來的反民主制度，並以「新宗主國」的姿態執政，同時壓制港人擺脫殖民結構下的奴性。中共選擇籠絡香港原有之殖民統治力量，繼續奉行「行政主導」、「精英吸納」等教條，香港左派當權之後，繼承大量殖民主義特權觀念及不平等權力結構，包括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只放眼短期政治利益而絕棄民主價值。由是者，身處百多年來無大變動的殖民權力體制，港人過往根本從未擺脫奴性。若說香港被英國殖民是一部受體「受辱」的歷史，而所謂「回歸祖國」，毋寧說是另一殖民政權對港人的集體污辱。

(王俊杰「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香港民族論』p.41)

資料 11 人種民族主義 vs 公民民族主義

香港民族並非以血緣為紐帶，而是以邊界、歷史、文化，加上「逃離極權、追求自由」的共同心理界定。香港主權移交後，香港民族主義遭受中共壓迫，由醞釀轉為爆發，所以其本質理應是反對壓迫或侵略其他民族，進而主張各民族於國際間平等。

民族身份認同乃出於對公民價值、文化及歷史的自覺，這亦是香港民族主義的最基本主張。談民族主義，先要將民族與種族清楚區分。香港民族主義必須脫離狹隘的人種民族論，以價值認同取代血緣認同，輔以土地、歷史等客觀條件，尊重個體自由契合的意願，塑造出一種公民民族主義。任何人願意加入香港，不論膚色種族，認同本土價值，忠於香港並以本土利益為先，即可成為香港人。

(王俊杰「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香港民族論』 pp.17-18)

傳統左派傳媒和人物的反駁「你們不是炎黃子孫嗎？你們不是黃皮膚黑眼睛嗎？香港人的祖先都是由中國移民過來的，你們流着的中國的血，所以生生世世都是中國人。」十分冠冕堂皇是不是？這種以血統論定民族的理念更被寫成一首膾炙人口的歌《龍的傳人》，「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看似無法反駁？那你肯定是將種族和民族的定義混淆在一起。種族才是按膚色和面部特徵劃分的，比如說白人、黑人、亞洲人、拉丁裔人等。在現代世界中，種族的重要性越加降低，在很多場合種族的分野甚至要忌諱不提。例如在求職時，種族一欄是可以選擇不填以減少種族歧視的機會。取消種族歧視、種族隔離法案，並且立法保護種族平等，已是世界潮流。以血統定民族，是十分落後的觀念，卻是現今中共落實的政策。

(李啟迪「香港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力？」『香港民族論』 p.66)

資料 12 「省港スト」の解釈

省港大罷工在中國工運史乃至世界工運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罷工沉重打擊了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並有力支援了發生在中國內地的國民革命運動，是香港史以及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事件。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新版)』三聯書店、2009年、p.153)

及後去到一九二五年，廣州及香港發生大規模罷工，聲援上海之反帝愛國運動。當時之華人精英視省港大罷工為共產主義者及廣州政府之陰謀，於是積極發起輿論戰，甚至不惜以特工組織等武力手段阻止罷工。高馬可教授(John Carroll)認為，省港大罷工是香港族群想像的重要階段，華人精英反對罷工，證明了他們乃「忠於本土、忠於殖民地體系，而不是向中國效忠」。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華人精英固然愛中國，但很大程度只愛中國之文化及國土，而非盲目效忠於朝廷。

(王俊杰「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香港民族論』p.35)

因為歐洲殖民者尊重地域文化差異，香港的粵語、典雅中文及嶺南風俗得到類似國家文化的對待而得以保存及弘揚，避過中共的文化滅絕運動。香港政府財政獨立，香港有自己的貨幣、護照、航權及國際身份，香港的典章文明、文化蘊藏、文化自主、經濟自主及政治高度自治的特性，使得香港具備城邦性格，可以為中國的現代化長期提供文化及制度之參考。

資料 13 都市国家論

(陳雲『香港城邦論』、天窗出版社、2011年、p.56)

資料 14 香港の「中国性」の否定

能透過科舉作上向社會流動，是陸上族群忠於儒家倫常的動機，亦為陸上族群融入中華帝國體系的國本。但蠶家一直被視為化外之民，到清代雍正期間才獲平權，之後亦無法與陸上大宗族書院的子弟競爭。閩南族群以航海貿易為生，亦不擅於科舉。是以在人倫的問題上，海洋族群遠比陸上族群開放：同性戀是海洋族群的成人禮，船上男女關係少繁文縟節，女性亦能憑實力得到認同。儒家倫理少求鬼神，多堅持克己復禮。祭神卻是海洋族群生活的核心，他們多生活禁忌，宗教活動極其華麗，凡事問卜神明，只求神明協助他們出海冒險，少祈求神明保守倫理和社會秩序。簡而言之，海洋族群及價值觀與中華帝國體系格格不入。

(徐承恩「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識史」『香港民族論』 p.132)

英國開始管治香港後，最終決定在香港行英式普通法。香港成為一個在中國之旁，卻在中國以外的城邦。中國那套靠科舉作上向社會流動的做法並不適用於香港。原先被排拒於科舉以外的海洋族群，卻能靠營商而得到社會地位。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辦學，修習西學的大多是沿海海洋族群或南洋華僑，於畢業後擔任洋行的買辦。他們取得香港的名利，又會到中國捐官，回港後再以華民代表自居，從而得到政治上的影響力。於是海洋族群便巧妙地利用中國與英國之間的角力，將香港建設成東亞海洋族群的第一座城邦。

(徐承恩「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識史」『香港民族論』 p.134)

香港必須高舉華夏文化主流，華夏文化來自傳統繼承，當中有傳統上、地域上和族群上的多元化，例如傳統華夏祭祀與禮教有周朝、漢代、宋明的傳統，有地域族群的融合（兩湖的荆楚、江浙的吳越、廣東的百越），有印度、波斯和近代英美西洋的革新刺激，復興華夏文化容許多元互動，也有活生生的民間道德實踐和風俗生活環境，那種融和、人人都有發言權、人人都有文化族群行動權的環境（在香港就有粵、閩、客家等族群），不會導致過分的排斥和法西斯主義。漢朝的華夏，是黃老道、古今文經學與董仲舒的重構，與周朝的不同。晉朝東渡江浙吳越之地，其華夏與中原的不同。唐朝的華夏，繼承晉朝的，也混合波斯與印度，與漢代的不同。宋朝的華夏與之前的不同，而且宋朝自身有南北宋之分。在西化甚深的香港，其復興的華夏，與商周、漢唐、宋明的華夏，自然大大不相同。正如英國的希臘羅馬希伯來，與法國的希臘羅馬希伯來不同。

資料 15 華夏正統論

(陳雲『城邦主權論』、次文化堂、2015年、
pp.56-57)

資料 16 香港の「核心の価値」

1970年代起，在港英政府的懷柔管治下，香港逐步建立起健全法制、廉潔政府、公平選舉、金融市場等現代化制度，由此塑造了自由、法治、廉潔、公平競爭、誠信透明等「在地核心價值」，構成了「香港主體性」的最重要內涵，並透過1980年代制定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全面鞏固下來。1997年主權移交後，從反對23條到反對國教等歷次「核心價值保衛戰」中，香港人透過共同的抗爭經歷，進一步產生了抵抗他者、守護我城的「主體意識」。

（方志恆「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香港前途宣言」
『香港革新論』p.XIV）

中國離心離德，是為本土運動興起的催化劑。不過，人們常有一個錯誤觀念，以為中國人之所以缺德，是文化大革命不互相撕咬吞噬不能存活造成的。其實，人性之墮落，遠早於文革，就以土改為例已可見一斑。

土改的本質是殺了地主，分他的土地財產，即是謀財害命。一種謀人財害人命的政策，可以得到全國人民支持擁護，這是怎樣一個國家民族？通常，盜匪達到謀財目的，就沒有害命的需要，中國大陸的史學家楊奎松解釋為甚麼中共謀了財還要害命，它要令「村裡過去被統治者與具有權威地位的人撕破臉，所以要「推動農民用激烈方法來對待地主、富農，把他們徹底打倒並踏上一腳，絕對不能簡單地把土地分了了事。」不搞暴力土改，只是分土地，「無法讓貧苦農民完全站到共產黨一邊來，建立起完全在黨政支配下的新政權，牢牢地控制中國的農村社會。」他為中共辯護說：「在這樣的時代，進行這樣的鬥爭，當然不能去講甚麼人權、人性的問題。」亦即承認是沒有人權、泯滅了人性。所以殺地主時雖然已內定了死刑，卻要公審，要由農民上台訴苦，讓人覺得殺地主是中共順應農民的要求，亦即是讓農民和地主階層結下血仇。情況就像《水滸傳》的情節，要上梁山落草為寇，先要在山下殺死一個無辜者，背上了血債，有了「投名狀」，才有合伙為匪的資格。這樣的國家，難怪李登輝稱之為土匪國。

資料 17 大陸の墮落

蘇賡哲「本土思潮的幾點釋疑」
（『香港民族論』pp.169-171）

本土派稱中共是外太空投下地球的病毒，但歷史事實是，中共是有民意支持的。沒有民意支持，它不能建立政權、沒有民意支持，它不能在六四萬方唾罵下發展成目前的貪腐大國。沒有這樣的人民，就不會有這樣的政權。土改可以謀財害命，奶粉製造者、食品生產者、玩具製造者為了謀財，當然就不顧人命。他們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不是時代有別，也不一定為了鬥爭，都可以這樣做，因為在文明程度上他們已經彌補了，彌成香港人以外的另一個民族了。

資料 18 中国崩壊論

獨立

若承認香港民族之存在，很多人會自然想到一個問題：「香港有足夠條件獨立成國嗎？」有說中共一日存在，港獨的機會微乎其乎，亦是以卵擊石。但從世界潮流來看，數個世紀以來，陸續有帝國分崩離析。

(王俊杰「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香港民族論』 p.19)

資料 19 香港の歴史の長さ

告別奴性 本土自立

中國大陸決意收回香港之後，其論調一直離不開「回歸」及「統一」，以「一國」凌駕「兩制」，完全忽視中港之間各種隔閡。當代香港體制於一八四一年開始建立，遠早過兩個當代中國政權，包括分別於一九一一年及一九四九年方始建國的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王俊杰「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香港民族論』 p.40)